

# 扑朔迷离的宋子文遇刺案

## “暗杀大王”接下刺宋任务

中原大战获胜后,蒋介石挟余威于1930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,通过了他提交的召开国会会议与制定约法案。此举遭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猛烈抨击,蒋介石一怒之下,将对方软禁在南京汤山。一场“约法”之争,导致宁、粤两派矛盾激化,粤派中央执委、监委纷纷提交辞呈,南下广州结成强大的反蒋联盟,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,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。

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,对蒋有宿怨的胡汉民亲家林焕廷是旧恨添新仇,他无法再隐忍,决定“拔刀相助”。当然,他不会亲自动手,而是通过找人暗中疏通王亚樵,试图借刀杀人。

素有民国“暗杀大王”之称的王亚樵曾组建斧头帮,专门从事刺杀活动。如今有人提着钱找上门来,他便一口应允了这桩“买卖”。然而,由于防范严密,他在庐山行刺蒋介石未果。

行动失败后,广东方面派人与王亚樵联络,决定将暗杀目标锁定在宋子文身上。蒋介石讨伐反蒋派,靠的就是宋子文的财政支持;杀宋对蒋来说,是毁其经济根基,釜底抽薪,如果得手,或许可以不战而胜。

当时,宋子文每逢周末自宁返沪憩息,周一再回南京办公。王亚樵手下郑抱真负责的行动组探知宋的活动规律后,决定派出三组人马在上海北站行刺,趁旅客下车之际,一来人多不易防备,二来易于动手后趁乱迅速逃离。

1931年7月22日晚,宋子文带着

六名卫士和秘书唐腴庐乘夜车由南京赴上海,次日晨7时抵达。就在列车到达上海前十五分钟,站内突然来了一队警察,将月台上的闲杂人等一概清除。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在这趟列车上,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赶来布置警戒。这使得第一组人马无法在月台上动手,于是急忙通知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组。

列车准时驶进北站。宋子文一行下车后,穿过月台,经过车站东大楼,向出站口走去时,预先埋伏在大楼楼柱后的第二行动组刘刚等人突然跃出,四五把枪同时从两侧向他们开火。簇拥在宋子文身后的护卫见状,连忙拔枪还击。

危急中,宋子文借助卫士的掩护,抛去十分显眼的帽子,拼命跑向人群,然后侧身躲到一根柱子后。而受到惊吓的唐腴庐则在出口处不知所措。

说来也巧,当天唐腴庐与宋子文的穿戴极为相似。当时情况紧急,第二行动组的人根本无法仔细打量,仅凭衣着就误判唐腴庐是宋子文,迅即对准“目标”射击。唐腴庐当即中弹,倒在血泊中。

## 日谍雇的杀手杀错了人

宋子文虚惊一场,毫发未损,而唐腴庐有如枪靶子,被人弹无虚发。难道仅是因为混乱中两人服饰相似?

当天,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恰巧与宋子文同乘一车,而日本军方想要谋害他,于是两件刺杀案不约而同地交织在了一起。

当时,日本军方指使日谍机关派人前往上海,有意挑起一场“有限战争”作为佯攻,以策应陆军在“满洲”的行动。

而重光葵“温良”的谋和方式,即主张以经济渗透巩固扩大在华权益和影响,显然与他们的“刺刀见红”主张格格不入,故而被视为是一种强力阻碍,于是,重光葵被列入他们的暗杀名单。

日谍机关特务田中隆吉雇了青帮老大常玉清为杀手。在得知重光葵将于22日晚乘车赴上海后,便决定在他出站时行刺。

也许是机缘巧合,重光葵把办公重心放在上海总领事馆,每周到南京公使馆处理政务一次,按时往返。这与宋子文往来宁沪两地时间吻合,故而经常同车前往,到站后又一同下车,几乎是肩并肩相伴出站。可不知为何,23日晨当列车抵达上海站后,重光葵先行下车匆匆出站,而宋子文则在车上待了一会儿才走。正是这个小细节使重光葵化险为夷,幸免于难;而宋子文一行则受到双方刺客的攻击。

由于现场出现了两路人马,加之枪声大作,火光四溅,在如此紧张气氛下,不免更加混乱。常玉清以为与宋子文前后脚的唐腴庐是重光葵,在仓促开枪后迅即离开。

## 刺杀现场还有第三派人马

美国传记作家西格雷夫在《宋家王朝》一书中则称这次枪击事件是杜月笙手下的青帮分子干的,原因是涉及鸦片走私纠纷。于是,谋杀案又添了一种说法。

一直以来,鸦片买卖是杜月笙等上海帮会的重要收入来源,不容他人染指。国民政府成立后,蒋介石有意要控制中国全部非法鸦片交易。为尽量

减少与青帮的矛盾,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跟杜月笙坐地分赃。蒋介石同这位“海上闻人”进行过一次长谈,双方同意共同经营鸦片生意:青帮的鸦片买卖将得到政府的充分保护;而作为回报,青帮同意预付六百万现钞给国民政府,作为其所得份额的第一期付款。谁知后来杜月笙反悔了,要求把钱退还给他。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,最忌讳的就是当“过路财神”,既然钱已落袋,他当然不情愿得而复失,于是便玩起了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把戏,用政府发行的债券冲抵。

用现钞换回的竟是一堆“废纸”,这一招着实阴损。杜月笙一怒之下,玩起了黑社会惯用的恐吓伎俩,以示警告。

《宋家王朝》一书中援引《纽约时报》1931年7月23日刊登的一则新闻,标题为《子弹没有击中宋》,是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的叙述。在作者看来,如果刺客们有心射击的话,毫无疑问宋子文难保性命。只是因为他们子弹“打偏”的缘故,结果全都打在了他的秘书身上。显然,他们得到某种指示,只为让宋子文“陪绑”,“享受”一下“枪林弹雨”带来的惊悚,事后心有余悸就足矣。

经历“生死门”,宋子文终于见识了杜月笙的厉害,强龙压不过地头蛇,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而杜月笙为了掩人耳目,事后亦是积极配合破案,以示此事与己无关。

逃过一劫的宋子文怎么也没料到自己竟会遭此厄运,想知道个中实情,然而事由缠藤绕树,似乎没人能够确切解读这“案中案”的谜底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韩文宁/文

## 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闹兵变

1864年,湘军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后,仅曾国藩麾下的人数就达到十余万。虽然朝廷对这股劲旅有防范之意,但曾国藩本人表现得比朝廷还急,主动提出希望从速裁撤三至四万人。几万名刚刚从尸山血海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,一下子被甩到社会上,这对于军队和地方的压力都是空前的。

朝廷撒下了丰厚的遣散费用。遣散费分为两部分,一是官兵此前的欠饷,二是军中将士发给士兵的“恩饷”。据统计,从1854年湘军成军出省,到1864年击败太平天国攻克天京,军中拖欠饷银接近500万两,曾国藩麾下十余万湘军,如果平均分配,每人都可得40余两银子,更不用算破城抢来的大小战利品。三四十两遣散费,足以在省城买一间小院子,或是在老家农村买好几亩地,这对于出身寒微的基层士兵来说已是实现阶层跃升了。

事实也是如此,湘军从军官到士兵,回乡置地极其踊跃。短时间内,大量白银货币流入湖南,造成当地通货膨胀,物价腾贵,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兼并大大加剧,大批农民沦为佃农。这些湘军老兵或是手拿大把军饷,或是靠军功谋得了盐业垄断权,或是开办票号、当铺,进军金融产业,“各项之豪买豪卖,无不设法垄断,贫民生计,占搁殆尽,实已不堪其苦”。仅湖南平江一县,湘军军功地主“收租几万担者十几家、几千担者无数家”。

遣散费用固然可观,可大小官吏打仗时期尚且欠十几个月的饷,仗打

完了每个军官会如实将遣散费发到大头兵手中吗?

很快,湘军名将鲍超麾下劲旅霆字营中发生哗变。此时,鲍超并不在营中,是营中官兵听说裁军消息,在营官申名标的组织下闹起事来。这个申名标原本是湘江上劫掠船只的水盗,又是哥老会头目,在营中党羽甚众。乱军迅速变成了武装劫匪,四处烧杀。更糟糕的是,听说霆字营哗变消息,其他的湘军迅速跟进,总兵李成谋、蒋凝学各军在湖北闹起来,何绍彩之训字营、欧阳胜美之义字营则在皖北搞事情,唐义训、金国琛、朱品隆等部在皖南开始哗变,刘松山之老湘营在龙潭闹饷……甚至李鸿章部下也想有样学样。皖南道张凤翥听闻哗变,马上赶去劝谕,结果这个四品大员被“扣留石垒,窘辱百端”,从事后来看,估计是被打个半死,湘军老兵甚至逼着他写下八个月满饷的欠条才放他走,但张凤翥受伤过重,没多久就死去了。

此事可以看出,湘军之中的哥老会势力潜滋暗长,已经尾大不掉,严重影响地方治安。随着湘军老兵的返乡,湖南哥老会势力急剧膨胀,许多湘军老兵从退伍老兵沦为官员口中的“哥老会匪”。

乃至武昌起义后,湖南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,首任都督焦达峰就是哥老会成员。湘军此次裁撤,无论是上层官场斗争,还是民间潜流,其影响都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,绵延半个世纪之久。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罗山/文